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公民教育与中国学校教育

潘一禾 | 最后更新: 2003-12-30

公民教育与中国的学校教育

潘一禾

学校教育一般指3-16岁,家庭教育则指0-16岁,因而它们有时间上的重叠。在这段时间里,父母和老师是儿童最重要的权威,儿童首先从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中,学习权力的获得、实施和对权力的范畴、空间、强度和时限的印象。许多中国家长发现,孩子一旦上学,家长的原有威信就大大下降,孩子开始变得只听老师的、不听家长的了。其原因之一就是孩子在观察体验中发现老师的权力更大、可以指挥的人更多,同时自己如果接受和服从这种权威,就可以获得这一权威的许可,逐渐等级递增地介入这种权威,指挥其他的同学,并可以指挥得越来越多。这种权力使用的范围和孩子直接参与权力的程度都大大超过家庭,所以孩子们心目中老师的地位“至高无上”。

法国作家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政治权威,无论其通过革命、战争还是殖民手段获得权力之后,都会首先把学校作为自己新统治的重要机构,通过语言和思想方式的强制性教育,来使不归顺的、不统一的个体、团体“同化”,使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国民成为一个共同体(communi ty)。由于学校教育可以同时教育数量可观的个人,可以系统地灌输政府希望公民具有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取向,所以政府总是更重视学校的政治教育功能。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试图通过统一的学校式教育整合原来相互争斗的部落和他们的方言,美国也寄希望于学校教育把不同民族背景的政治文化组合成一个共同认可的国家文化。

学校是正式的、有效的和系统化的政治社会化渠道。在现代化社会,由于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从儿童到青年时期,人总要接受系统的、正规的和较为长期的学校教育,这种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正规的公民文化的培养过程。在世界各国的学校中,学生们无一不在系统地学习有关政治的课程,学校把政治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引导学生的政治兴趣,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训练学生初步的

政治经验等等。一般而言，学校教育巩固和拓展了青少年在家庭早期影响下所形成的政治态度，确立了某种政治价值体系以及对政治系统的认识和认同，培养较为清晰和完整的政治取向。

学校的政治教育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正式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课程。这种课程在西方国家也往往被称为公民课程，因为这一课程的意旨在于培养适合现行社会制度的健全公民，这是国家兴办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所以这一课程受到相当重视。这一课程的设置对于学生学习掌握基本的政治知识，初步树立政治信仰、树立爱国的基本精神和感情、训练正确的参政态度等等，都有直接明显的积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总是具有个体的差异，学校政治方面的课程如果与学生在家庭中所受的影响一致，则作用效果较明显；倘若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不一致，则作用效果较差。学校政治教育的第二条途径是人在一生中所进入的第一个团体，开始了解并且适应团体生活及个人在团体生活中的恰当位置，认识团体中的角色、规范，了解组织和制度的实际涵义。这一实际经验的获得是第一种途径所取代不了的。这些经验往往影响个人对权威的看法与态度，对团体的感情与态度等等。

目前中国学校的政治教育（确切说是“政治思想教育”）应该说是花时间、花力气、上下一齐抓的重点政治工作。从小学到大学，从研究生到博士生，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里都规定了必须严格执行的政治教育课程和教学时间。国家也一再组织专家学者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改革的深入，改写或增删相关的政治教育教材，近期尤其是重点添加了公民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内容。但在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许多令人担忧的现实，2001年最初的两个月，全国不少报纸参与讨论了有关《中国青年报》首发的关于许多孩子从小学起就开始在学校里“争”当学生干部的报道。2001年2月，《辽沈晚报》报道：一位赵先生的儿子正读小学三年级，儿子过生日时提出要在家摆一桌请同学吃饭。结果父亲发现，儿子平时要好的同学一个没来，儿子请来的全是班里的干部，至少也是位居中层的“小组长”（以下还有课代表等）。赵先生对儿子的做法感到吃惊，儿子则表示，班上过新年给班干部送的贺卡都要是最好的，而且平时同学们也经常请班干部出去“撮”一顿（转引自《浙江青年报》，2001年2月10日，第三版，《儿子生日设宴，非班干部不请》）。其实孩子的这种选择与他平时的体会和观察是紧密联系的，我们的许多小学班干部可以手拿小本本在各种不同的方面给其他同学“打分”，凭自己的意愿确定其他同学的“表现”可以拿几颗“五角星”（并且这些结果还要张榜公布，每个同学每天都可以在教室的墙上读到自己的品德和成绩“排名”），当他们在做这些“管理工作”的时候，他们自己可以免去“早自修”令人头疼的背诵课文或经老师允许少做作业之类。在班干部换届的时候、在上课举手发言的时候、在换座位的时候、在确定“保送”名额名单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同时在学校的日常活动中接受“政治教育”。这些教育与他们在课本上学到的政治知识、道德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的青少年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逐渐让它们不再是矛盾的。

同样，据《金陵晚报》报道，2001年2月，南京不少返校的大学生拎着从家乡带来的名酒名烟和土特产走进校门。这些礼品多半是送给系里老师的。“多数同学送礼给老师是为了表达对教师的感激之情，但是有一些学生却另有所图。某校一位四年级同学就打算送礼给系主任和学生处负责人，他说他这是为毕业分配打基础，他的一位师哥去年分配前就曾给系主任送过礼，在某通信公司进校招人举棋不定时，系主任的推荐起了决定性作用。小丁给辅导员送礼是为了改善师生关系。他大一时和同学打架，师生关系从此颇为紧张。小丁现在急于给辅导员留下好印象是因为他听说，分配时有关人士的一句话会对用人单

位的录用起到关键作用。”（转引自《浙江青年报》，2001年2月13日，第四版，《南京：大学生拎着礼品返校》）虽然记者在这样的报道中明显认为这是一种不良或不正常现象，因为这些同学实际是向一些教师手中的权力“送礼”，是希望换得日后“特权”对自己的照顾（实际也就造成对其他同学的不公），但记者那句“多数同学送礼是为了表达对教师的感激之情”，还是说明他个人也认为学生应该可以对教师用“礼品”表达谢意。目前中国教育体系的内部管理也与政治机构的内部管理是如出一辙的，即是一种行政式的管理，更加上一些现代数字化管理。所以教师如果不是因为个体的素质和道德水准而自觉摒弃所谓的“师道尊严”，则他们完全有可能利用由自己决定的出试卷题、改卷评分、指定班干部、写导师评语、发放奖学金、分配推荐等机会“滥用”自己的“师长”权力。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父权、夫权、师权与政权是一个体系的东西，它们相互支撑、互为交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打不掉、挣不脱的“人治网”、“人情网”和“法制网”。它们分享强制人身权力的合法性，并且连成一体，软硬兼具，在具体的权力行使和操作过程中，分别让一些人尝到甜头、让另一些人尝尽苦头或总结经验教训，所以这种父权、夫权、师权、政权与财权、强权的“大一统”，总能获得人们“得到了喜欢、得不到憎恨”的双重评价、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不确定的动态评价。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瓦解、腐蚀、冲淡那些“政治教师”常年累月、辛辛苦苦“灌输”给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等知识积累。

龙应台在99年5月的《百年思索》演讲中讲到：“素质与知识有极其关键的差别”，“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科学新闻》2000年第四期发表了宁鸿的一篇文章，也提出“道德不能靠灌输”的论点。应该说类似的观点都对我们长期坚持的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及其教育方法、教育期望提出了质询。在人类已经开始向知识经济迈进的时代，我们要注意知识与道德的区别。知识不是道德，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不等于具有高尚的道德。关于道德的知识也不是道德，道德的知识能引起人们对道德的注意，但它本身不是道德。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还是道德知识，都是属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这一层次，道德则是属于超我这一层次。道德是从小到大自然不知不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和有意识的道德自我训练而形成的思维和社会行为的伦理倾向，不是靠灌输道德教条就能解决问题的（转引自《报刊文摘》，2001年2月19日，第二版，《科学新闻刊文提出：道德不能靠灌输》）。我们现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实际主要是一种政治道德教育，即希望祖国的下一代能够成为“五讲四美”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这种期待不能仅靠时间、资金、人员和管理的保障就能实现的。事实上，我们的下一代还在他们所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中接受潜移默化的政治教育。

当然，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媒体，学校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人们接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往往决定个人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作为类的划分，受过高等教育和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的政治取向往往不同。列宁曾把民主与教育水平联系起来谈，因为除了识字水平作为民主的实际操作的必要技术条件以外，受教育的多少也影响到人们对民主价值的相信程度和理解深度，民主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形成离不开国民教育程度和水平的普遍提高。阿尔蒙德等人的调查研究也发现：一个人受教育时间越长，往往其政治兴趣越浓，参与意识越强，对政治的认知也越系统和完整，对一些基本政治价值的认识也越深

刻。但中国的现实也提醒我们：失败的学校政治教育也可能使年轻的一代对政治以及相关的知识及领域产生逆反心理、抱有冷漠或远离态度，甚至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转而采取表里不一的行为方式。比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学（实际也就是政府）不再“包分配”，许多高校出现递交“入党申请书”火爆的场面，高校开设的“业余党校”也报名极其“踊跃”。在这种力争早日入党热情的背后，潜藏着大学生对“入党”有助于“求职”和“提升”的社会现实的理解，折射了这一代人聪明早熟而又主动识实务的人生态度，并不真正反映他们通过中小学的政治教育，产生了比老一辈更多、更强烈的对党的纲领的认同或向往。

在一个人的整个社会化过程中，从儿童到成人这一段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一则因为这一时期是人系统地接受教育的时期，可以系统地学习政治；二则是因为在此阶段，随着人的生理方面的发育，人的心理也经过一个发育过程。在青少年时期，人的世界观、基本人格都没有形成，因而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人在这一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政治人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个方面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即心理发育、人格形成阶段的人系统地接受社会教育，系统地进行政治学习，就可以逐步形成其政治文化的各项具体内容的基本定向和特点。由此，虽然我们从小学低年级的课本里就开始学习许多中外历史故事和伟大的政治领袖的事迹，包括政治巨人“小时候的故事”或“少年伟人”的故事，在中学和大学阶段，我们要求学生了解无数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和数不清的“重要会议”和“决议”，但有些历史知识除了让他们知道“幸福是从哪里来的”，并不能真正引导我们的青少年领悟“公民”的责任和“政治”的内涵。我们最需要与学生们一起讨论的问题应该是：人性、及人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我们应该与学生一起讨论：为什么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一个经济动物和一个政治的动物；为什么人在天然地要追求权力、财富和个人幸福的同时，应该是一个孟子所说的有“侧隐之心”的人；他如何可能通过努力做到这一点；以及社会是如何被逐渐地设计成今天的这个样子的；人类文明的惊人成就和巨大遗憾是怎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我们面前……等等。正像霍布斯在《利维坦》引言中所说：“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去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

潘一禾：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长征、木新月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